



上海出版资金项目  
Shanghai Publishing Funds

# 袁牧之全集

小说卷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上海出版资金项目  
Shanghai Publishing Funds

# 袁牧之全集

小说卷

杨新宇 编 上海文化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袁牧之全集. 小说卷/袁牧之著; 杨新宇编. --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9. 8  
ISBN 978-7-5535-1569-4

I. ①袁… II. ①袁…②杨… III. ①袁牧之  
(1909-1978)—全集②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88522 号

出版人: 姜逸青  
责任编辑: 黄慧鸣  
装帧设计: 王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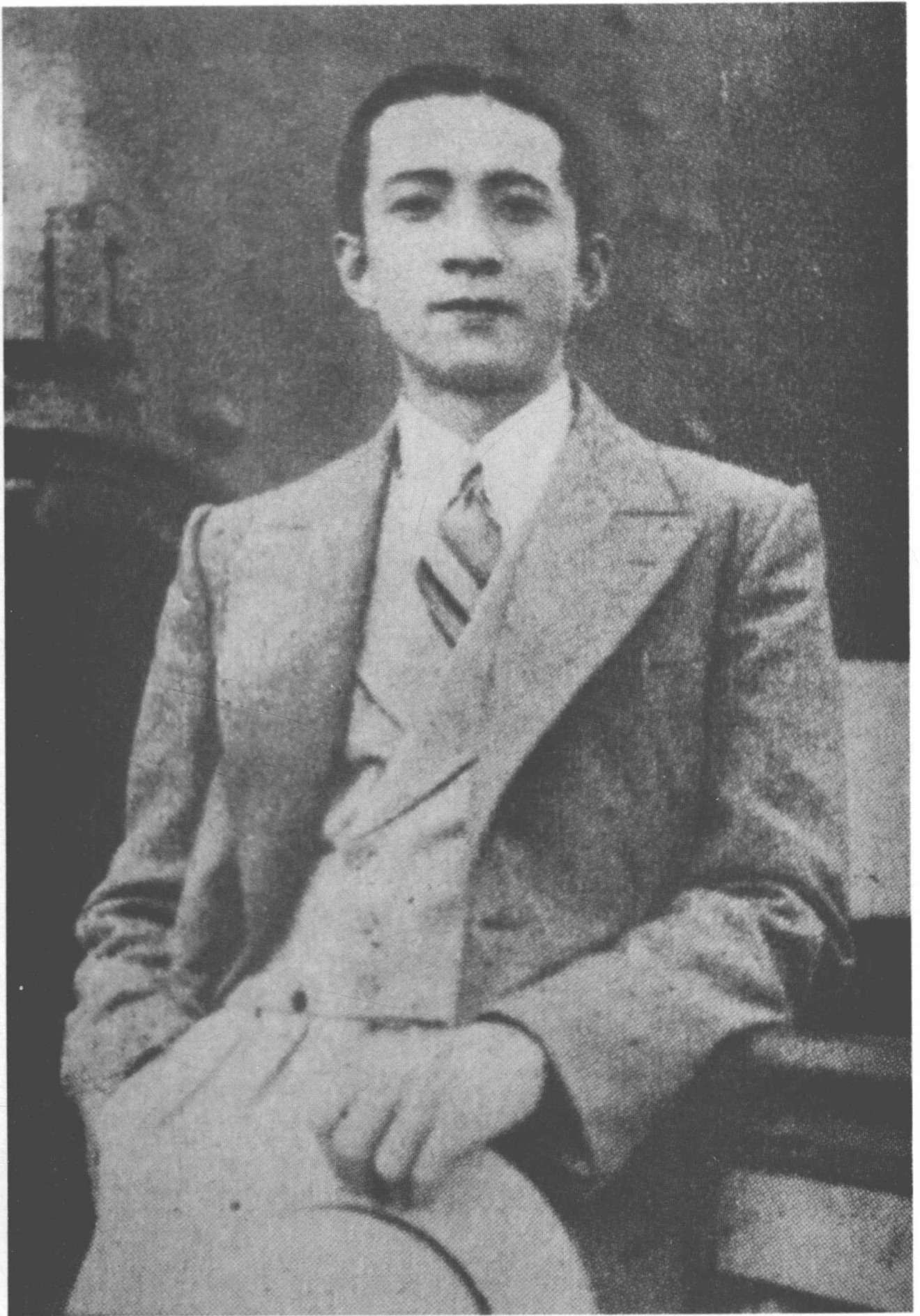
书名: 袁牧之全集·小说卷  
作者: 袁牧之  
编者: 杨新宇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号 200020  
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8.25  
印次: 2019年10月第一版 2019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35-1569-4/J.395  
定价: 98.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81806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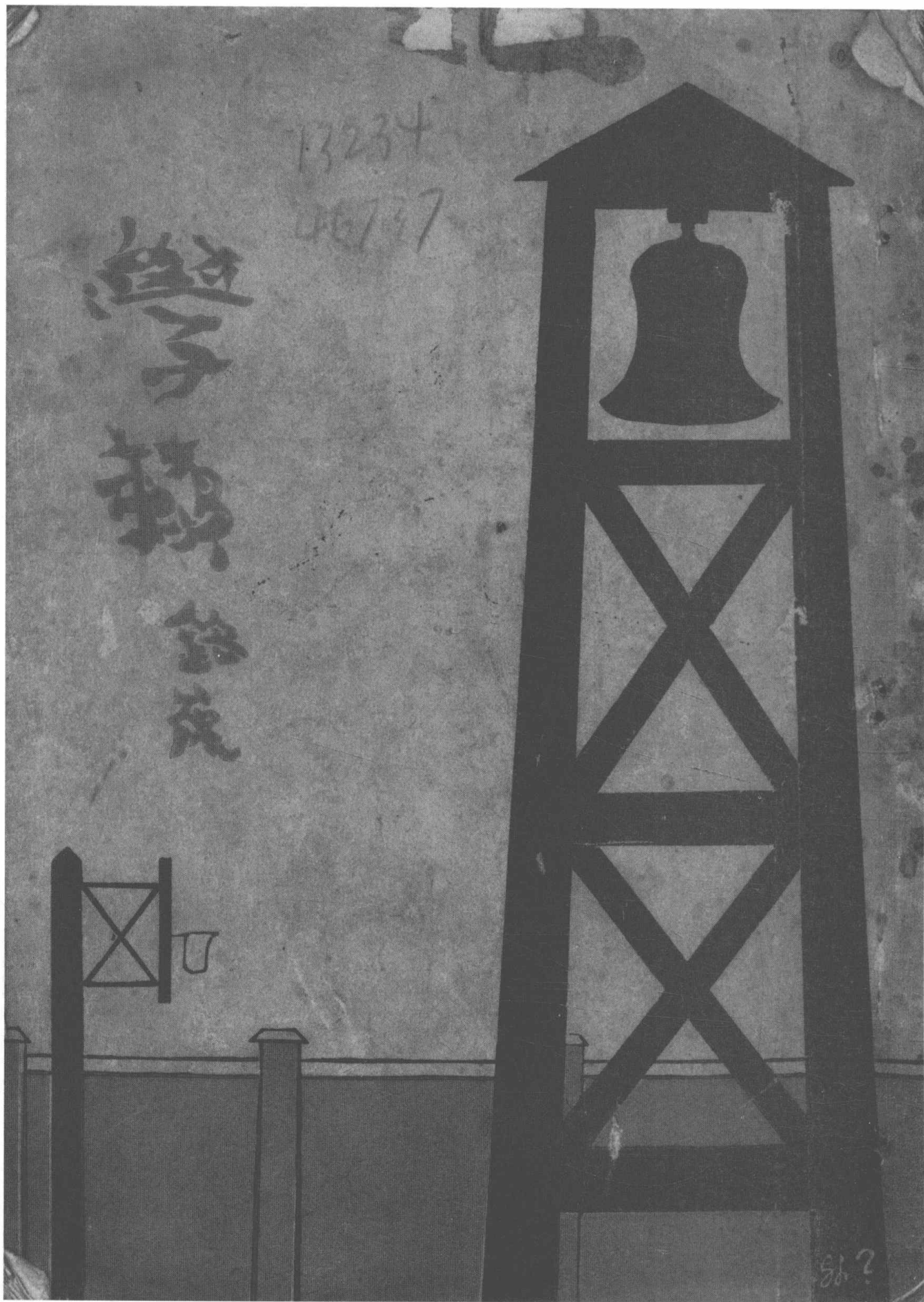
少年时期的袁牧之



《矛盾》1933年10月第2卷第2期所刊袁牧之照片



《良友》1934年12月15日第100期电影专刊袁牧之照片



袁牧之为《学籁》（春季号）所绘的封面

## 出版说明

袁牧之(1909—1978)，原名袁家莱，浙江宁波人，是中国电影史上最重要的电影艺术家之一，他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影坛崭露头角，无论在电影表演、编剧、化妆造型，还是导演，乃至电影事业管理等方面均做出过开拓性的重要贡献。

袁牧之不仅是中国电影史上不可多得的天才，又是中国早期话剧舞台上重要的表演艺术家，也是风格独特的剧作家。

袁牧之从童年起即对戏剧感兴趣，五四运动后，他在宁波老家，受到学生演讲与演剧的影响，曾与小亲戚们组织了家庭剧社，对家庭剧社不再感兴趣后，也曾参加过学校里的戏剧活动。袁牧之自1922年后到上海跟随同父异母的姐姐生活，先后在澄衷学校和东吴二中读中学，在积极参加校园演剧的同时，他也加入了洪深等主持的上海戏剧协社。戏剧协社是当时爱美剧运动中有名的上海剧团，据袁牧之自述，在戏剧协社“我虽然连参加演出的高度都不够，但因为我是社员，每场帮着招呼以及其他的杂干”，虽未正式参加演出，但也渐渐地“已懂得这些戏之不同于文明戏和化装演讲，至少在形式上”。由于他就读的东吴二中是东吴法科的附中，为了造就将来律师人才起见，二中的教程很注意于演讲，袁牧之“对于演讲很下过一翻[番]苦功”，并多次在演讲比赛中获得过优胜，当时他的人生志愿就是做一个演说家，但这些演讲也确实为他后来的演剧生涯打下了基础。1926年袁牧之又加入了朱穰丞领导的辛酉剧社，辛酉剧社时期是袁牧之一生重要的发展阶段，他的人生志愿正式开始由演讲转向戏剧。袁牧之在辛酉剧社主演过《酒后》《桃花源》《狗的跳舞》《文舅舅》等剧，从一个戏剧新人迅速成长为辛酉剧社的台柱子，也成为当时话剧舞台上一时无两的耀眼明星。袁牧之刻苦钻研演技，成为外形演技的代表性人物，后来胡导称之为中国第一个性格演员，并且深刻地影响了更年轻一代的赵丹等演员。

袁牧之在演剧的同时也开始努力写作，不仅创作独幕剧，也写作随笔记录演剧的经验与教训。1928年11月，刊登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生杂志》上的《演讲的研究》，是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袁牧之自述这件事对他以后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他以后敢于卖文度日，有勇气脱离家庭有密切关系。1930年，辛酉剧社无形解散，袁牧之也中学毕业，在姐姐安排下，他考入东吴大学法律系，但不久离校。袁牧之自述：“等我越想越错，自认是错尽错绝的时候，我情愿牺牲家庭以及遗产，由学校里偷偷地搬了出来，隔绝了一切亲戚，开始努力于写作生活了。这样经过了一年之久而

没有饿死，家庭方面当然也不能再有什么威权，于是我现在的名字也不再在亲戚间秘密，演剧也可以公开了。”由此，袁牧之开始了一边写作一边演剧的“波希米亚式”的都市流浪生活。或许是卖文度日的原因，他的创作中，开始出现了小说，而在时代的深刻感召下，他也逐渐走向了左翼的道路。1933年复旦剧社《五奎桥》的公演和同年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两周年上海戏剧协社《怒吼吧！中国》的大型公演，他都积极参与，虽非主演，但却以其精湛的演技获得了观众的赞誉，这两次演出鲜明地体现出了袁牧之艺术道路的转向。

1934年，袁牧之等一批著名的舞台人，加入左翼电通影片公司，电通公司原是电影录音器材制造公司，是在中国共产党电影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转为制片公司的。从舞台转向银幕，袁牧之也由此开创了自己人生的辉煌。

袁牧之共主演过《桃李劫》《风云儿女》《生死同心》《八百壮士》四部影片，编导过《都市风光》《马路天使》两部故事片，其中《桃李劫》《风云儿女》《都市风光》由电通出品，《生死同心》《马路天使》则是电通结束后，袁牧之转入明星二厂后完成的作品，《八百壮士》则是全面抗战爆发后由汉口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完成的抗日影片。这几部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均有着重要的地位，《桃李劫》虽非中国第一部有声片，但却真正使得声音成为电影的艺术元素，可谓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有声片；《都市风光》则更进一步，是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前无古人，且罕有来者；作为中国现实主义影片的经典之作，《马路天使》一经问世就获得了高度赞誉，它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艺术发展最高峰的标志，获得了乔治·萨杜尔等著名电影史学家的高度评价，其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更被意大利影评家达西达奇认为早出意大利享誉世界影坛的新现实主义电影许多年；《风云儿女》对于国人来说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袁牧之是银幕上唱响国歌的第一人。

《都市风光》《马路天使》中显现出的天才，宣告了一位世界级电影大师的诞生，然而袁牧之的故事片创作，竟然就止于这两部作品，这让无数电影史学家扼腕叹息。袁牧之当然并未中断工作，而是投入了更广阔的、实际的革命工作。淞沪抗战爆发后，袁牧之先是去武汉，因为认识到新闻纪录电影的重要作用，完成《八百壮士》后不久即奔赴延安，着手延安纪录片的创作。1938年9月初，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在延安宣告成立，团长由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任，袁牧之则任艺术及编导负责人，它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电影机构，标志着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电影事业的开端。在袁牧之领导下，当年10月1日，电影团开始拍摄由他担任编导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这部影片不仅在延安拍摄，而且还深入到华北敌后去拍摄，历尽千辛万苦，直到1940年3月才最终完成。然而受条件所限，延安无法洗印，受党的委派，袁牧之与负责影片音

乐的冼星海秘密前往苏联，不幸的是，这部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纪录片虽然洗印出来了，但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在向阿拉木图撤退过程中遗失了《延安与八路军》的全部拷贝。

由于战争的阻隔，袁牧之战时一直滞留在苏联，其间曾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担任著名导演爱森斯坦的助手，参加了《恐怖的伊凡》（现通译《伊凡雷帝》，但译名有误）的拍摄，后在爱森斯坦推荐下，执导了表现哈萨克吟唱诗人江布尔生平的纪录片《江布尔》。直到战争结束，袁牧之才于1946年回到祖国，并立即投入了接收伪“满映”的工作。在舒群、袁牧之的领导下，由伪“满映”改组的东北电影公司将全部电影器材及电影职工圆满迁移到哈尔滨，最后又撤退到兴山。1946年10月1日，东北电影公司正式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舒群任厂长，袁牧之任顾问。12月，舒群调离，袁牧之接任厂长。东北电影制片厂（即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后又迁回长春）是解放区人民电影的第一个创作基地，袁牧之作为主要的奠基人和创建者，筚路蓝缕，大力推进电影队伍建设，培育电影人才，并提出“七片生产”的口号，在重点拍摄新闻纪录片的基础上，积极进行故事片、美术片、翻译片等其他片种的试制。在袁牧之的领导下，东影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惊人的成绩，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展，为新中国电影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战争形势的明朗，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于1949年4月5日在北平正式成立，袁牧之出任第一任局长，成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袁牧之不仅对电影事业的发展有全局的把握，从宏观上提出了一系列的电影发展规划，如每年制订年度制片计划、提出三年计划设想等，并且在队伍建设、剧本创作、制片发行乃至胶片、机器的供应与制造等实际工作中提出了一整套具体方针、政策、计划和措施，短时间内建立起了党对电影事业的坚强领导。从制片方面来讲，重点抓北影、上影及东影三大国营厂的生产，并适当扶助当时仍然存在的私营制片业的再生产，使国产进步新片迅速占领市场，肃清美英片和旧中国消极影片的影响。为了集中展示国产新片的成绩，袁牧之提出举办“新片展览月”，自1951年3月8日开始，在全国二十一个大城市举行了未曾上映的二十六部新片的展映，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检阅了人民电影的力量。在发行放映方面，建立了全国电影发行放映网。在东北、华北、华东、西南、西北、中南六个大区成立了六大影片经理公司，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影片经理公司，并开始建立国外的发行代理关系。为了扩充电影放映队，1950年袁牧之亲自主持，在南京举办了规模宏大的“中央电影局放映训练班”，一次性增加了六百个电影放映队，充实了两千名专业放映员。袁牧之还将企业化管理作为目标，在制片和发行有所保障的前提下，国产电影实现了利润上交。电影不仅成为党的

宣传事业，而且支援了经济建设。在袁牧之的规划下，1951年后相继成立了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即北京电影学院前身）、电影剧本创作所、中国电影器材公司、新影厂、解放军电影制片厂（八一厂前身）等，袁牧之甚至颇具前瞻性地提出了“首都电影村”的设想……可以说，新中国电影事业的辉煌与袁牧之的不懈努力和艰苦创业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在袁牧之的领导下，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电影事业蒸蒸日上。遗憾的是，历史留给袁牧之的时间并不多，从1952年年底开始，组织上对袁牧之提出的“电影村”的设想展开了批评，此前他已被安排去“休养”，到1954年，袁牧之的工作已完全为别人接替，被迫辞职，正式离开了中央电影局局长岗位。此后，他不仅离开了电影事业管理工作，而且更远离了他曾无比热爱的电影创作，除去1953年为吕班剪辑《六号门》，1958年支持第二任妻子朱心写作电影剧本《鲁班的传说》外，他与实际的电影创作几乎再无关系，到了晚年，他甚至不再看任何电影。然而，袁牧之并没有真正忘记电影，也没有停止工作，他后半生的心血几乎全部倾注在了电影剧本《小小环球》的创作上，或许这也是袁牧之在离职以后继续为党工作的唯一方式。这里不能不提及袁牧之的第二任妻子朱心（原名朱世藕，昆曲演员，婚后由袁牧之为之改名朱心，取“红心”之意），朱心女士与袁牧之结婚时，袁牧之已是“一介平民”，然而朱心却无怨无悔地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丈夫，全力支持袁牧之的创作，甚至放弃了自己大有前途的表演生涯。她不仅陪伴袁牧之到少数民族地区搜集材料，而且担任了他工作中的助手，誊抄了大量稿件。“文革”中，没有任何职务的袁牧之也受到冲击，被下放到干校，在妻子的扶持下，才得以度过九死一生的艰难岁月。

尽管袁牧之后半生的坎坷经历令人唏嘘，他未能再创辉煌，但仅以他已取得的成就来看，不用说他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诸多“第一”，仅仅《都市风光》和《马路天使》两部影片就足以彪炳千秋；同时在话剧领域，袁牧之也是一位风格独特的剧作家，他的“两个角色的戏剧”颇有特色；袁牧之甚至还是一位长期不为人知的小说家，他的连载小说《三个大学生》在诸多文学史著作中被误当作剧本提及，但其小说同样独具风味，具有鲜明的都市感，早在1934年，茅盾已称其《名师与高徒》为“难得的作品”，而且其某些小说与他的电影剧作也有重大渊源；袁牧之还非常注意理论总结，不仅出版有专著，还发表过不少单篇论文。袁牧之作为世界级的电影艺术家、风格独特的剧作家、被遗忘的新感觉风的海派小说家，其作品是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但目前其著作的整理还不够完整和全面，这与他的历史地位是极不相称的。袁牧之生前出版的著作仅有剧作集《爱神的箭》《两个角色演底戏》和《钟楼怪人》，以及专著《演剧漫谈》和《戏剧化装术》，此外小说《三个大学生》和剧本《玲玲》，当年曾有过出版预告，但未详

是否真正出版。长期以来，经过整理的袁牧之著作仅有一部《袁牧之文集》行世，此书1984年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但其容量非常有限，除以上五部著作外，所收录的袁牧之集外文字很不完整，比如集外话剧剧本仅收录了一部知名度较高的《一个女人和一条狗》，小说更是仅收录了一篇《理发师小胡子》。

因而全面搜集整理他的著作，编辑出版《袁牧之全集》是极其必要的。袁牧之在诸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其人本身就是值得后人瞻仰和研究的，袁牧之又是时代的绝佳象征，他的人生历程是民国时期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典型缩影，但长期以来资料的欠缺，极大地制约了袁牧之研究的深入，袁牧之的重要地位只是部分地被学界认识；同时，他的一系列论著，也是重要的历史文献，具有极强的史料价值。因此，《袁牧之全集》作为学术资料，它的出版，可以说，对于全面认识袁牧之的创作成就，呈现他的完整形象，以及深化中国话剧史、电影史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上海文化出版社继《郑君里全集》后，又欣然接受《袁牧之全集》的出版，彰显了文化抱负，祝愿这一系列戏剧电影家的文献能够成为上海文化出版社的品牌，并能持续坚持下去，为发掘和弘扬上海文化传统，发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作出贡献。《袁牧之全集》的出版曾得到袁牧之女儿袁牧女、袁小牧的大力支持，在编纂过程中又有幸得到陈明、冯骏、朱天纬、解治秀、陈子善、薛昭慧、庄君等专家的帮助，特此致谢。

《袁牧之全集》按照袁牧之的创作实际，共分四卷：“电影卷”“话剧卷”“小说卷”“论著卷”各一卷，编排上尊重作者生前自己结集出版的作品集，将其置于每卷卷首，然后依发表的时间排列集外文字。好在袁牧之的创作历程有明显的阶段性，其后期更因实际的革命工作，除相关工作报告外，基本放弃了写作，直到离职后才开始了《小小环球》的创作，因此，袁牧之著述的搜集工作相对还是比较容易的，然而文献的查找毕竟是很难穷尽的，与诸多作家全集一样，《袁牧之全集》仍有不可避免的遗漏，已知《东影通讯》1949年第23期上的《袁局长在东影欢送会上的讲话》和《业务通讯》1950年第1期上的《新年献辞》，就因没有寻获而未能收入。尤为遗憾的是，因袁牧女导演的遽然辞世（袁牧之的资料主要由长女袁牧女保管），袁牧之的遗稿一时难以查找，《袁牧之全集》仅收入了袁小牧提供的《创作随记（草稿）》及一些曾公开过的遗稿片断（令人欣慰的是，为创作《小小环球》而写就的《创作随记（草稿）》，虽带有明显的时代印痕，但却是一篇有关电影民族化的重要文献）；袁牧之的家信也尊重家属的意愿未予收录；袁牧之的其他书信也未能征集。期待学界同仁在《袁牧之全集》出版后，不吝赐教，开展补遗工作，进一步丰富袁牧之的文献，以冀将来有机会做更完善的增补。

2019年是袁牧之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袁牧之全集》第一次全面地汇集了这位杰出的话剧、电影艺术家留给我们的宝贵艺术遗产,它的出版是对袁牧之最好的纪念。有心的读者一定能够在这些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的探索和思考。

编者

2019年6月

## 编辑说明

1. 《袁牧之全集》共分四卷，分别为“电影卷”“话剧卷”“小说卷”“论著卷”。每卷收入相关内容，编排时以作者生前出版过的书在前，单篇作品在后，两部分原则上以时间为序。如原文的出版或写作时间不详，则排在所在卷或所在专辑之末。

2. 原文均注明版本出处，便于读者查询。

3. 原据版本中的繁体字、异体字、俗体字在排版时均转为规范的简体字。

4. 原作中出现的外国人名、地名、著作名等专有名词，若其译法与现在不同，在不影响读者理解的前提下，均保持原作的译法，如：卓别麟(卓别林)，契可夫、柴霍夫(契诃夫)，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史大林(斯大林)，《文舅舅》(《万尼亚舅舅》)等。原稿中明显的外语拼写错误，则直接加以修改。

5. 原稿中出现的旧时用字和旧语法，在不影响读者阅读的情况下，均保留原貌；根据现代汉语规范作修改处，以及原刊明显错误修改处，均作页下校注。

6. 部分原稿中的标点符号用法与现行标准有很大不同，如书名号均作引号等，为便于读者阅读，按照现行标准进行统一，为简洁起见，不再一一作注。

7. 正文中表示时间、数量、刊物期数等的数字，保持原貌；注释则按现行标准。

编者

2019年1月

## 分卷说明

本卷收入袁牧之创作的十九篇小说，按发表的时间先后排列，其中有三部小说不完整。

《三个大学生》，曾出现在曾今可《爱的逃避》一书书末所列“新时代文艺丛书”书目的出版预告中，或由上海新时代书局印行过单行本，但该书未见，未知是否真的出版过。本卷只能收入《新时代》上连载未完的版本。

《神女与女神》亦因所刊载的《小说》停刊，未能连载完。

《一个圈子绕回来》，自 1935 年 9 月在《趣味》图画半月刊第三期开始连载，但因后续的期刊未能找到，连载情况不详。

# 目录

- 1 流星
- 9 可怕的屋子
- 17 眼睛
- 25 几多男女同病者？
- 31 奶妈
- 85 三个大学生
- 127 女人心
- 135 阿五的丧礼
- 149 生命线的旋律
- 171 “一张五块钱的汉口票”
- 181 我死了
- 189 理发师小胡子
- 201 膜
- 213 名师与高徒
- 223 泄
- 229 寻人
- 237 神女与女神
- 259 一个不用镜子的女人
- 271 一个圈子绕回来



## 流星

载《民众生活》 1930年第1卷第20号。